

## 第八章

### 模范

一个男人要成为农业劳动模范或村领导，他必须擅长那些通常属于男人的工作，甚至有所创新。妇女劳动模范则不同。她必须一边做一些跟妇女通常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的事，一边又继续做她之前的工作。妇女劳动模范倡导改变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此举对男人和妇女都产生了影响，减轻了男人从农业转到大坝建设、乡村工业和技术监督职位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对农村发展的理解必须要提及妇女劳动模范，她们一边体现着国家运动的效果，一边却又模糊了国家和社会的边界。

50年代，数以百计的蹲点干部分散到关中和陕南的各个农村。她们将成就显著的妇女树立为劳动模范：技能熟练的农民、忠于职守的接生员、精明能干的家畜饲养员、锲而不舍的植棉能手。国家干部使劳动模范得以显形，地方干部则训练这些劳模，并在当时以及事后长篇累牍地记录她们的生活。公开报道她们是为了鼓励其他妇女也效仿她们的行动，官方记载报道了党和国家官员期待妇女所应该具备的品质。这些官员的反复申明被视为是国家的声音。作为贮藏社区美德和成就的场所，劳动模范是将独立的农村空间同想象的地区、国家甚至是国际空间联系到一起的地标。她们栖居于一个弥散且模糊不清的区域，国家效果即从这一区域中产生。

本章探索 50 年代早期到 60 年代初的妇女劳动模范的集体产生，并集中关注国家行为、集体和个人生活之间的模糊边界。依据的材料既源自 50 年代的当地干部和新闻记者所创作的关于劳动模范的报道和宣传，也源自那些搜集于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几年的前劳模和干部的回忆性自述。<sup>1</sup> 本章讲述的故事以三位种植高产棉花的陕西劳动模范为中心。她们分别是：渭南的张秋香，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及省人大代表；<sup>2</sup> 于 1962 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的潼关的山秀珍，她亦是本书第二章的主角；<sup>3</sup> 第三章描述的恪守妇道的领导

---

<sup>1</sup> 出版的材料包括：传略、新闻报道、照片、画报、讲话、档案会议记录、和（20 世纪 80、90 年代）方志中的回忆文字。档案材料包括会议记录和妇联的工作报告。除了文字记录之外，还有与前劳模们、劳模的乡亲们、和跟劳模们一起工作过的前妇联干部们的访谈。关于一位山西农村妇女劳模的传记，见天和 1999 年。

<sup>2</sup> 除了本章援引的材料外，官方有关张秋香生平的信息和为效仿她产棉成就所作的努力亦见于如下材料：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3 年：第 385-91、511 页；渭南地区地方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273-74、418-20、960 页；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4 年：第 482-87 页；《妇女画报》第 6 期（1958 年 3 月 16 日）；第 15 期（1958 年 8 月 1 日）；第 18 期（1958 年 9 月 20 日）；第 20 期（1958 年 10 月 16 日）；第 21 期（1958 年 11 月 1 日）；第 22 期（1958 年 11 月 16 日）；第 8 期（1959 年 4 月 16 日）；第 9 期（1959 年 5 月 1 日）；第 14 期（1959 年 7 月 15 日）；第 15 期（1959 年 8 月 1 日）；第 16 期（1959 年 8 月 16 日）；第 18 期（1959 年 9 月 15 日）；第 5 期（1960 年 3 月 1 日）；妇联 1958 年：190-025；全国联 1960 年：未注页码；姜兴汉、程万里 1958 年。

<sup>3</sup> 官方有关山秀珍生平的信息，其中包括她在陕西省和全国担任过的主要职位，见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3 年：第 512 页；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4 年：

曹竹香。<sup>4</sup> 本章依据的材料还包括鲁桂兰的经历，曹担任过合作社领导，并分别于 1951 年和 1957 年成为省劳模和全国劳模。<sup>5</sup>

劳动模范是极少数几个名字出现在官方记载里的农村妇女。然而，读者若要从有关劳动模范的文献中找寻关于她们独特生活经历的连贯叙述，或从中寻找以真实人物为主角的对农村集体化的详细记载，那么便会大失所望。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即讲述一个人如何度过其人生的故事。相反，劳动模范的故事要我们既关注具有特定目的的、关于一个妇女劳模生活的社会生产，又要关注这种生产作为许多不同的人群和交往的产物，是如何被传播、发生变化以及被记忆的。

50 年代关中地区的妇女劳动模范被用去建设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棉花种植。妇女应该植棉这一想法被大肆宣传，它出现在省级的会议上，出现在有关试验田的新闻报道中，这些试验田是由敢于大胆创新的妇女劳模们搞起来的。它甚至还通过比赛得到宣传。比赛的内容是对女性农民们发展的最好的农耕技术进行运用和改良。本章追溯“只有妇女适合植棉”这一发现，探索男人如何转去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并勾勒出劳动竞赛中已婚和未婚妇女所起的显著作用。

最后，本章考量当代读者期待从传记中得到的真相披露，尤其是由全方位的材料和记忆所披露出来的关于一个人内心思想和情感的信息。劳动模范的故事对内在性的存在提出了质疑，或者至少对假定的内在性的形状进行了质疑。本章以我的一些思考结束：在重大的国家工程如集体化刚刚结束之后，传记是否可行或者可取？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一时期的农村妇女的生活提出其他问题？

## 美德的谱系

50 年代农村劳模妇女的故事与古代许多具有美德的妇女的故事在主题上互相呼应：勤劳、苦难、关注他人的福利、自我牺牲（尽管是为集体而非为父系宗族）、以及没有性关系的纠纷。<sup>6</sup> 如帝国晚期故事里的贞节寡妇和尽职尽责的母亲一样，劳动模范积极并且坚定。帝国晚期，有德行的妇女的传记的出版既给她们的家庭和社区带去了荣耀，同时又为更广泛的读者和听者大众宣传良好的行为提供了榜样。相类似的，30 年代末、40 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的中共指定的劳模也是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把劳模看成是人民群众和领导

---

第 504-9 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潼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 年：3-6 页；张如云、张自强、赵国玺，1992 年；《西北妇女画报》第 14 期（1952 年 9 月 1 日）；中共潼关县委党史研究室 2001 年：第 87-88、90、98-100、106、109、116-18、123-26、136-37、139 页；潼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2 年：第 154、528 页。

<sup>4</sup> 除了本章他处和第三章援引的材料外，关于官方对曹竹香生平和她的集体的记载，可见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4 年：第 182-89 页；《西北妇女画报》1953 年 5 月 1 日；《妇女画报》第 16 期（1958 年 8 月 15 日）。

<sup>5</sup> 除了本章他处援引的材料外，官方有关鲁桂兰生平的信息，可见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4 年：第 510-19 页；《妇女画报》第 17 期（1958 年 9 月 1 日）。

<sup>6</sup> 当然，帝国晚期和社会主义早期的妇女模范之间的差别也很重要。即便像曹竹香那样，寡妇身份和模范身份紧密相连，50 年代的劳模也并非直接因她们的贞节而受到褒奖。劳模跟一些早前的有美德妇女不一样，既没有人人设立牌坊去纪念她们，也没有人认为她们死后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感谢曼素恩与韩起澜提出关于这些差别的问题。

之间的桥梁，将领导的想法和方针带到群众中去，再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馈给领导。<sup>7</sup>总而言之，劳模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关键。<sup>8</sup>

1950年，这些战争时期共产党根据地“老区”设立劳动模范的做法成了陕“新区”的范本。这些新区主要集中在关中和陕南，并且不属于先前解放了的地区。省里十位劳动模范被选去参加1950年的一次全国大会。同年12月，陕西省的农民代表被动员去找出并培训劳动模范。<sup>9</sup>1954年，培养和提名妇女劳动模范是妇联的例行工作。<sup>10</sup>

如第三章曹竹香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当一个村或生产队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劳模时，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劳模的成就就会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像旧制度下有德行的妇女一样，劳动模范成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来源。中共的官员同鼓励编辑地方志的帝国官员一样，都希望通过宣传记录她们的丰功伟绩来促进对劳模的效仿。

当然，有关美德的古老故事和50年代的劳模故事有相当大的差别。早期中国的有美德的妇女通常因她们的贤明和对统治者的大胆进谏而受到颂扬，<sup>11</sup>但是帝国晚期的妇女典范则更普遍地因她们在家庭领域内的活动而受到褒奖。50年代的劳模故事重新组合并改造了这两个时期的要素。像早期中国文本中的妇女一样，50年代的劳模通常被卷入到一项政治任务中：建设社会主义。和早期中国的女豪杰不一样的是，她并非通过抓住权势人物的注意力来参与到这项任务中去，尽管与权势人物如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接触是劳模故事的一部分。同帝国晚期的典范妇女一样，50年代的劳模通过认真从事日常劳动来实现政治目标，只是此时，她们是在家庭领域之外、而不是在家庭领域之内从事日常劳动。

当经典文本和方志中的美德妇女的故事浮现在世人眼前时，她们通常都已经年老或者去世。事实上，那些故事中的许多故事都需要戏剧性或别种原因的死亡，来使一个忠贞地度过一生的妇女的故事完满。相反，50、60年代许多农村妇女劳模则需要持续地参与到她们的事业当中去。例如，由于植棉而闻名的张秋香，要持续在产棉上推陈出新，要在省级会议上汇报她的成绩，还要参加全国的劳模颁奖典礼。这些全国性的典礼常常都是公开的，并且不断地表明，国家的举措正在地方上产生良好的变化。已经去世的劳模的价值十分有限。<sup>12</sup>一个劳模必须在世才有效用，并根据党和国家目标的变化积极地迎接新的挑战。

---

<sup>7</sup> “劳模运动的发展和问题”农业厅 194-8（未注日期，在1950至1951年之间）。有关延安的劳模，见斯特拉纳汉（Stranahan）1983年之一，1983年之二。

<sup>8</sup> 有关群众路线，见赛尔登（Selden）1995年：第212-13页。

<sup>9</sup> 一份1951年的报告提到了12个这样的劳模的名字，其中的两个妇女因为领导其他组的妇女去参加农业生产而特别受到褒奖（“劳模运动的发展和问题”农业厅 194-8）1952年，一名来自宝鸡县的妇女王爱英（音译）因使麦子获得大丰收而被写成劳模（《妇女工作简讯》第14期（1952年7月）：第12-15页）。

<sup>10</sup> 例如，见妇联 178-130-030 1954年（9月22日）。

<sup>11</sup> 瑞丽（Raphals）1998年。

<sup>12</sup> 党和国家在1949年后确实广泛利用了死去的模范：刘胡兰（第四章提及）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都因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而被称颂；死于1962年的雷锋因其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愿成为革命的一个螺丝钉而受到赞扬。然而，一个人若要成为劳模，必须活着去完成劳动，他/她的劳动任务最好不要直接导致死亡。

## 搜寻

元代的记录表明，当时有美德的妇女是这样确认产生的：先由其邻居告知当地官员，随后这些官员再将她们推荐给当朝皇帝。<sup>13</sup>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发或线性的，而是需要动用许多家庭和社区的力量来争取与节妇或贞女相关的奖励和威望。尽管如此，这种确认看起来是从地方社会一直往上到达官方，并对朝廷列出的选拔指标作出响应。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陕西，有美德的妇女却不仅仅是由国家召唤或由邻居提名来产生的。她们必须被创造。如 1951 年民政局下达给地方官员的一些指令所言，劳动模范要被“发现和培养”。<sup>14</sup> 党或政府的干部是默认的创造劳模的人。蹲点干部确定潜在的先进者，诱导她们担起领导角色，为她们培训必备技能，在她们遭到反对时支持她们，然后推荐她们获得国家的认可。

对社区之外的人而言，为确定劳动模范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很容易出岔子。一份 1951 年的报告指出，不够敏锐的干部曾错误地将不守纪律的退伍士兵、国民党管理人员、地主、甚至土匪选为劳模。不适合选为劳模的名单里还有一种情况，即几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被提名为劳模。<sup>15</sup> 这份文件并未言明为何这是个错误；报告假定读者会知道这是个错误，就像她会知道土匪是不适合当劳模一样。也有可能是，人们不认为未婚或已婚的年轻妇女具备成为有效的劳模所需的经验和当地人的尊重。此外，一个前妇联干部说，年纪稍大的妇女（解放时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的妇女）直接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有些曾是逃荒的难民，有些则嫁到了极度贫困的家庭里。她们对共产党有非常明显的感激之情，蹲点干部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感情去动员她们去田里劳动：那时是中年妇女首先冲出家门。这几个劳模特点一个是有强烈的事业心，就是说要干什么非要干好。她们一说起就是咱在旧社会能干个啥，现在妇女解放啦！党培养咱；咱就要给党争光吗！第二个是这几个都比较勤劳朴实。<sup>16</sup>

年轻的妇联干部作为更大的蹲点工作组的一部分，最经常做的工作是确定潜在的妇女先进者，将她们发展为羽翼丰满的劳动模范。在没有农耕妇女能手的村子，妇联干部们选出潜在的劳模——通常是年轻的已婚妇女，开课教她们农耕的技术。<sup>17</sup> 1952 年，她们召开颁奖典礼，授予模范妇女——有时是个人、有时是团体——锦旗和有用的农具：喷雾器、步犁、小锄头、毛巾。这些劳模的功绩在全县大会上得到表彰。<sup>18</sup> 然而，对那些要成为本地以外的劳模的妇女而言，但凡国家新的优先事项需要充满活力的模范代表，一个更深入的培训和准备过程便必不可少，即生产出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讲者。

---

<sup>13</sup> 柏文莉 2002 年：第 509 页。

<sup>14</sup> “劳模运动的发展和问题”，农业厅 194-8（在 1950 年至 1951 年之间）。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 年。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妇联 178-116-009 1952 年。

## 演讲

到了 50 年代中期，增减棉花产量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棉花于 4 月播种，10 月收获，除了在解放战争期间有所中断外，从 30 年代起便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sup>19</sup> 1952 年，全省的棉花播种面积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sup>20</sup> 在党和国家出版物里明显的“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叙述中，1949 年之前的棉产量很低，1949 年的平均亩产量只有 26 斤。<sup>21</sup> 据称，“七疙瘩八疙瘩，一亩地能产三捆花，喜得农民笑哈哈”。1954 年，棉产量达到了每亩 52 斤，据说有些农民认为产量还可以再高些。<sup>22</sup>

纺织品出口对购买苏联的设备和资本积累至关重要，提高棉花的种植是增加纺织品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sup>23</sup> 关中被看成是为西北和华北的工业棉纺厂提供棉花的主要地点。50 年代之前，妇女在关中采棉并对棉花进行加工，但初级社成立后，国家有关当局开始将妇女宣传成首要的植棉者。<sup>24</sup> 党和国家突然发现植棉工作适合妇女，并认为她们双手灵巧且能够对细节一丝不苟。<sup>25</sup> 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由此作出调整，男人于是逐渐从棉花种植中抽身出来，进入到副业的生产当中去。<sup>26</sup>

---

<sup>19</sup> 据弗美尔（[Vermeer] 1988 年：第 324-25 页）估算，棉花的种植面积占关中地区所有耕地面积的 12%到 15%，在灌溉区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弗美尔虽然只简短地提及了农村妇女被鼓励去组织棉田管理小组这一事实（第 359 页），但对关中地区棉花种植和纺织生产的历史（第 324-82 页）作了全面介绍。

<sup>20</sup> 同上，第 346-47 页。1957 年棉花播种面积达到新高（317, 000 公顷和超过 110, 000 的棉花），这个集体化时期的记录只有到了 1973 年和 1982 年被追平。关于 50 年代对棉花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各种不同估计数字，见中国经济委员会 1969 年：表 20-B, 20-C, 和渭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420 页。

<sup>21</sup> 高小贤 2006 年之一：第 595 页。1949 年之前，棉花生产一直是关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尼可尔斯 [Nichols] 1902 年：第 248-49 页）。芮乔松（1955 年：第 15-16 页）指出，1949 年前，由于陕西省没有机械化纺锤和织布机，超过 80%的棉花作物都被运往上海、青岛和其他东部沿海城市去加工。1953 年，陕西，主要是关中，产出的棉花是西北总产量的 90%。到 1955 年，党和国家开办和扩展了一些棉纺厂，其中包括五家大型国有棉纺厂。

<sup>22</sup> 妇联 178-216-002 1960 年（1 月 17 日）：第 1 页。

<sup>23</sup> 弗美尔 1988 年：第 347 页。他还说道，在 1954 年，“为国家生产棉花被描述为一项公民的责任，种植棉花的合作社将会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贷款、种子、肥料）”（第 352 页）。1955 年 9 月，有了强制性的产棉指标，不久之后，植棉者不再准许留有棉絮私自使用或售卖。从 1955 年开始，国家对所有的棉花有提前购买权，付给合作社的钱比个人的要多。结果，1955 年许多植棉的农民开始转而种粮食，或在非法的自留地上种棉花以逃避国家的强制性采购。50 年代中期，很多人都非法保留棉花并将之卖到黑市。弗美尔对这些冲突的叙述是以发表在《陕西日报》（第 352-54）上的文章为依据的。有关 1957 年农村地区极低的棉布定量供应，以及限量供应“对当地手工布制品的生产——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所起的推动作用”，见第 355 页。

<sup>24</sup> 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 年。在陕西，妇女和棉花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但一直以来都更注重妇女对棉花的加工而不是种植。比如，见尼可尔斯 1902 年：第 129 页。

<sup>25</sup> 有关这种转变的讨论，见高小贤 2005 年，2006 年之一：第 608 页。

<sup>26</sup> 这种情况属于更广阔的“农业女性化”现象的一部分。关于“农业女性化”，详见第五章和第九章的讨论。正如高小贤所说，拾棉花开始的时候，他也讲同工同酬呢。

农业局的蹲点干部和当地的领导一起致力于提高棉花的种植。当干部们为了棉花生产而去动员妇女时，他们首先去找那些家里极度贫困、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学会农耕的年纪大一些的妇女。曹竹香回忆，那棉花一直咱都种着哩，52年技术站上说棉花不够苗数，不够栽。齐主任来说，我说人家说那棉花栽不活，踏不死，齐主任，那都是原来的说法，你栽，能栽活，老焦，老牛，那都是技术站上的人那来都帮助，给我栽棉花哩，弄棉花哩。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曹竹香学到了有关作物虫害的知识。她开始用化肥和农药、而不是草木灰除虫。在52年我种棉花栽的棉花一个都没死。<sup>27</sup>

离曹竹香家不远的双王乡八里店村，还有一位善于植棉的妇女张秋香。早在1954年4月于渭南召开的第一次省棉花工作会议上，张秋香的植棉技术就开始广人所知。她开始是在一亩地上种棉花，后来扩大了种植面积。通过仔细用肥，她的亩产差不多达到了两百斤，随后每年都增产。<sup>28</sup>1955年，秋香的村子据说产生了一个“奇迹”：一块地的籽棉产量达到了每亩1,250斤。<sup>29</sup>妇联干部认为秋香将会成为一个有前途的模范，开始争取同她合作。<sup>30</sup>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干部来到她的村子，寻找各种途径去宣扬她的经验，使她成为一个容易为其他农村妇女所理解的模范。<sup>31</sup>

来自一个极度贫穷家庭的张秋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她于1908年出生在山东，有过难民的经历。1949年之前，她一边种地，一边将手工制作的鞋子拿到市场上去卖。她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同许多关中的家庭一样，她的丈夫在四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工作。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她分到了一块满是砖块和瓦砾的庙地。这些东西都必须清理干净，地才能耕种。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参与了合作社的建立。到了50年代中期，她已经当上了村长（选我，那时干部没人当，嫌得罪人。），带领着几个互助组，接下来她还会继续当初级社、高级社和公社的主任。<sup>32</sup>她对革命十分忠诚，她的农耕技术亦堪称典范。1956年，她被提名为县级和省级劳模，1957年，她成了全国劳动模

---

但男人去拾棉花拾不过女人的时候，男人不是说拾不过你就给他低一点，男人就不顺应做这个事，男人去做更高的，有技术的活去了。那女人仍然是什么最低的。这个跟农业女性化有关，妇女大面去做农业的话，男人就都出去了。（我本人2008年11月10日与高小贤的交流。）

<sup>27</sup>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sup>28</sup> 与张竹香的访谈，1996年。弗美尔（1988年：第358页）认为“猪养的不够多”和70年代初之前没有化肥是导致关中地区的棉花种植缺乏肥料的原因。

<sup>29</sup> 妇联 178-216-002 1960年（1月17日）：第1页。张秋香自己说，过去（日期不详）当地的平均亩产量是55斤皮棉，但在1955年，她和其他八个妇女开始种植九亩丰产田和一亩多的高额丰产田。1955年和1956年，丰产田产出了700斤籽棉。高额丰产田的产量是：1955年1,225斤，1956年1,104斤，1957年早年为940斤（皆为籽棉数量；《陕西日报》1958年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1958年：第60页给出的那几年的数字略有不同（每亩籽棉分别为1,225，1,102和874.5斤）。

<sup>30</sup> 与李秀娃的访谈，1996年。

<sup>31</sup> 1996年与王梅花和李秀娃的访谈。

<sup>32</sup>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年。

范。<sup>33</sup> 然而，她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劳动模范，还要满足更多的要求：她必须学会在公共场合演讲，讲解政策，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激发人们的热情。<sup>34</sup> 尽管秋香是植棉能手，她却不善言辞：张秋香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一些。她没有文化。有一次把她请到省上来开大会，大概是三八妇女节大会吧！在会上介绍经验老太太挣着急忙介绍不了。<sup>35</sup> 蹲点干部们并未因此退缩气馁，而是开始着手工作。她们跟随她到田里，耐心地访问她，将她说的话转换成格言警句，并教她记诵直到她能够流利地演讲。干部们为她编了一首著名的顺口溜，虽然译成英语听起来不十分恰当，在中文里却十分贴切：

运用辩证法

看天看地

务棉花。<sup>36</sup>

当干部们说起她们如何为张秋香编顺口溜时，我们也许会不由得想自己编一个关于国家干预的故事：从一块不大可能的材料中创造一个能言善辩的劳动模范。很明显，秋香并没有在棉田里对着自己吟诵辩证法。我们可能会小小地“啊哈”一声：国家如《绿野仙踪》里帘子后的那个男人一样，在生产和包装一个看似是真实的基层女劳模时被当场抓了个正着。

匆忙作出这种阐释的危险是：它证实了我们已经准备好去了解的事。在中国对毛泽东隐秘的性生活、共产党的内部争斗、“大跃进”时期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进行了多年的披露之后，我们把这些以前的故事作为衡量我们长大后天真不在的标准。如今，我们同样有把握的是，我们知道一种不一样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认识，那就是，在一层薄薄的国家声明的表皮下是一层更广阔的、通常是强制性的国家操控（顺口溜和劳模即在这层操控下被编制和传播）；在国家声明的表层下，是一个刚起步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真正的中国”，饱受磨难的农民栖居于其中。这个中国时而柔顺，时而具有抵抗性，但却始终不同于一种叫做“国家”的东西。

这种轻视中国社会主义的常识同更早时候对革命的同情一样，都太过简单了。顺口溜及其他类似的轶事让我们得以透过妇联和其他干部们极其仔细繁琐的日常工作，对生产女劳模的艰苦过程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希望让一个农村劳模去展示辩证法的词汇和新的种植技术，使这些词汇和技术更为人们所熟悉。同时，农村妇女自己也为学习新技术和克服个人恐惧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一位前干部评论道，不是说党委一培养，妇联一支持她就起来了，没有那么容易，特别象张秋香，既不识字，又不会说话，不会总结自己经验，要问她务棉经验，她说就是口外种好，按时锄好，打卡好就对了，硬是咱们妇联同志

---

<sup>33</sup> 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3 年：第 387 页；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617 页。

<sup>34</sup> 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 年。

<sup>35</sup> 同上。

<sup>36</sup>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 年；与王梅花、李秀娃的访谈，1996 年。1963 年，当省有关当局在“大跃进”后数年的气候和政治问题后开始重振棉花经济时，报刊上也出现了这句顺口溜，见《陕西日报》1963 年 4 月 10 日，第 1 页。

从她的哪能些话中掏出来，提炼出来。这以后她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羽毛也就丰满了，这说明在培养妇女典型人物上，咱妇联是付出了一定的心血和辛勤劳动，以及认真地手把手帮助。<sup>37</sup> 在妇联干部帮助秋香写了一些演讲稿之后，秋香的故事里开始包括了一些关于妇女多么能干的评论：当我们在 1955 年开始务育丰产棉时，有的男社员嘲笑说：“妇女门只能鞋上绣花，怎干吹牛务丰产棉花！”我们没有理睬这些风凉话，用妇女翻身的事互相鼓励，拿定心劲干下去。<sup>38</sup> 随着秋香名气的增长，蹲点干部们依旧留在她的村庄并担任起她的秘书。他们帮助这个不识字的植棉冠军迎接访客，每天答复数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这些信件要么要求秋香提供棉花种子，要么希望得到她的建议和鼓励。<sup>39</sup>

1956 年 4 月，为植棉妇女们召开的第一次全省棉花工作会议在渭南举行，秋香的成就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宣传。<sup>40</sup> 在蹲点干部的指导下，她学会了用生动的趣闻轶事来展现她的农耕经验，四十年后当我们采访她时，她这项技能依然清晰可见：56 年庄稼好的很，棉花也好，苞谷也好，可是水上来淹来，咱又是社长又是村长，把群众发动到大平原上，那个时候青年人都能干，那苞谷都熟了，后此我跳到河里，叫大家都下去，弄个萝萁把苞谷搬的往上运用，把几十亩苞谷搬完了，到了一场，把外晒干，杆子还在地里。<sup>41</sup> 当一个劳模能够出色地讲演时，日常的耕种任务就为展现个人和集体的英勇行为提供了机会。

1956 年，秋香正式当选为劳模，被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她对自己当选的叙述遵循了劳模呈现自我的惯例：谦逊、惊讶、以及继续超越他人的决心。当说到北京开会哩，还不知道是当劳模哩。县上、乡上，让到乡上去，然后到北京。心情当然高兴，当劳模还得下苦。我原来就下苦，不是为当劳模，做惯了，把啥做不好，心里不得过去。<sup>42</sup>

一旦一个劳模的资历和威望被建立起来，她在公共场合讲话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证明她的过去，而是要为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任务努力进行动员活动。因此，我们发现山秀珍在 1961 年对渭南县公社社员的一次演讲中，不仅报告了最近一次棉花生产会议的内容，还提醒大家控制虫害（“虫子像敌人一样向我们侵略”）、除草、防洪和施肥的重要性。<sup>43</sup> 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一刻，已不再

---

<sup>37</sup> 与李秀娃的访谈，1996 年。这份距离事实四十年的叙述，也是一个妇联干部为肯定她自己年轻时的工作所作出的一种努力。高小贤（2006 年之一：第 601 页）写道，“妇女干部和农村劳动妇女共同生产了劳模，这些劳模们的‘经验’既植根于妇女的工作环境中，又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程所塑造”。

<sup>38</sup> 《陕西日报》1958 年 3 月 20 日。

<sup>39</sup> 与王梅花的访谈，1996 年。

<sup>40</sup> 与李秀娃的访谈，1996 年。关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见高小贤 2006 年之一：第 596-97 页。有关当时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见《陕西日报》1956 年 4 月 19、20、21、22 日；妇联 1956 年：154-039。

<sup>41</sup>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 年。

<sup>42</sup> 同上。中国人民银行（1958 年：第 60 页）说张秋香是在 1957 年被选为全国劳模的。

<sup>43</sup> 农业厅 194-748（1961 年 7 月 13 日），第 47-49 页。



需要公开唤起她的背景。她的生平故事是公共的财产，决定了她关于劳动的劝诫将会如何被大众理解和听取。

## 劳动

2005年，高小贤在一篇有关模范植棉妇女的文章中指出，50年代中期棉产量不断增产的工作通常不仅需要妇联干部，也还需要来自省政府部门、农业大学、甚至是中央部门的技术精湛的农业技术员长期在农村驻守（“蹲点”）。这些技术员负责许多对选种、栽种、除草和收获进行的革新工作。他们并不是直接宣传这些创新之举，而是利用劳模们的故事来传播有关植棉技术的具体信息。正如高小贤所言，这些集中体现辛勤工作、团队合作和牺牲的故事有“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来”的特点，因此易于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劳模是新技术推广的媒介。<sup>44</sup>

劳模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为投身于农村集体化和遵循党的总路线的积极公民提供必备的政治行为的典范。熟练的技术是必需，但还不够。还需要关注国家甚至是国际事务。大部分的农村妇女劳模受到褒奖，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棉花高产或修缮了水利设施，还因为她们跟党和国家一起进行抗美援朝，为远方的战士准备爱心包裹。与朝鲜的团结一致以一种非常熟悉的本地针线活的形式呈现出来。妇女们通过针线活将自己缝进国际形势之中。包裹里装有布块、针线包、日常用品和手工小礼物。关于劳模成就的报告清点妇女们制作的爱心包裹、钱包和手套的数量，就如清点出售给国家的棉花吨数一样。社会性别化的农村劳动是由从未离开过家的妇女完成的，但她们却认为自己跟从未见过的远方有紧密的关系。妇女们还组队为家里有男丁在朝鲜打仗的军人家属犁地，并用刚学会的字给士兵们写信。（妇女是否真的在这件事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模范活动的广度。）一个劳模的必备特质是要在这样的工作中起领头作用，在本地的生产过程、国家的政治情势以及国际政治团结这三者之间结建立紧密联系。由外来干部发起、却由当地劳模发展成型的国家和国际意识也被同时介绍进来。<sup>45</sup>

当党和国家加紧了对农村粮食市场的控制时，可靠的劳模们则带头售粮、甚至是捐粮给国家。<sup>46</sup> 植棉的劳动模范们要树立榜样，将最好的棉花以不断上升的数量转交给供销组织，而不是将之囤积起来。<sup>47</sup> 随着合作社从互助组扩大

---

<sup>44</sup> 高小贤 2005年，2006年之一。

<sup>45</sup> 有关曹竹香支援朝鲜战士的活动，见妇联 178-27-026 1952年。我不想对这些爱心包裹作过多的表述。很难说农村的妇女们早上醒来便会思考她们与国际大团结之间的关系。但在50年代，“美国”和“朝鲜”成了她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sup>46</sup> 有关山秀珍捐粮食给国家，见妇联 178-209-036 1954年。有关曹竹香带头售粮食给国家，见妇联 178-27-026 1952年。

<sup>47</sup> 囤积棉花同取消粮食生产一样，是个不断复现的问题。妇联干部张秀玉（1996年的访谈）对她的“爱国教育”工作描述如下：防止棉花流入自由市场，教育妇女向国家多交花，交好花，教育她们懂得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多亏国家，因此不能忘本，不能忘国家，在困难时期，不准偷偷摸摸，要交爱国棉，我们在大荔县抓了一个村，效果很

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热情洋溢的劳模是说服顽强抵抗的农民入社的关键。<sup>48</sup>

劳模的目的是激励大家对其进行积极效仿，这种积极效仿通常以劳动竞赛的形式来实现。<sup>49</sup>在陕西，最有名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劳动竞赛是由陕西省妇联举办的“银花赛”。该项竞赛从1956年起在关中的植棉区开始举办，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sup>50</sup>银花赛旨在鼓励妇女参与棉田管理和夺取棉花丰产。1956年4月，在陕西省党委的指示下，省妇联在渭南县主持召开了一次植棉妇女大会，正式拉开了这场劳动竞赛的序幕。当时，许多陕西妇女依然没有参与到为集体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当中，只有在农忙季节才到田里劳作。党和国家通过动员未被充分利用的妇女劳动去管理棉田，目标是为了增加棉花这一劳动密集型作物的产量。这次会议有674名妇女参加，植棉妇女在会上展示了经验，同时还进行了关于种子品种和种植技巧的讨论。以张秋香为领导代表，所有与会者都签署了保证书，承诺带领妇接管大部分的植棉任务，让植棉区的妇女全年至少做到140个工作日，还承诺在各个集体单位之间组织劳动竞赛。

在这些劳动竞赛的过程中，妇联将张秋香、曹竹香、山秀珍、以及另外两名当地有名的妇女植棉能手誉为“五朵银花”，这一称号是受到当时一部很有名的电影《五朵金花》的启发。<sup>51</sup>每个植棉能手领导一个植棉小组，该小组采取承包责任制并按产量支付酬劳。妇女们相互之间学习技术，分工明确，责任到人。<sup>52</sup>B村的竹香建议她组里的年轻妇女们要“学习双王，赶上双王”。双王是秋香的务棉小组所在地。但竹香说，她们应该以这个谦逊的口号作为掩护，努力超过秋香组的棉产量。<sup>53</sup>山秀珍县里的一个党委副书记向她提出了挑战：他说听说张秋香56年都务了高产棉，你会务吗？我说咋不会，我会务。我就到渭南张大姐处取经去，第一年，棉花长的真正好，但还是缺乏经验，水吧太多，棉花长的太高大，群众说这拾棉花还要上树呢，不然够不着，这不好。平均210多斤皮棉，“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总结教训。<sup>54</sup>

---

好，县委就在全县推广。我们抓的那个队那一天交了1000多斤，全县那一天交了几十

万斤吧，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这说明在棉花开花时节，棉花的流失量很大。

<sup>48</sup> 有关合作社转型时期的陕西妇女积极分子，见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宣传部1957年；中国共产党丹凤县竹林关区委员会1956年。

<sup>49</sup> 有关1952年山秀珍发起的一场竞赛，见西北民主妇女联合会生产部1952年：第11-13页。

<sup>50</sup> 以下关于银花赛的叙述，除非另有说明，皆引自高小贤2005年，2006年之一。高对竞赛发起的经济背景作了讨论。她还指出，陕西省党委在这些竞赛中起领头作用，农业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妇联则负责大部分的组织工作（2006年之一：第597页）。

<sup>51</sup> 与王梅花的访谈，1996年。另外两名妇女是薛俊秀和高贞贤。1958年，除了这五位著名的妇女外，还有一百多名妇女在这场劳动竞赛中获得劳模称号，一共有17,665个植棉组参加了这次竞赛（2006年之一：第597、604页）。

<sup>52</sup> 高小贤2006年之一：第599页。有关当时对妇女植棉的报道，见《陕西日报》1956年4月29日、5月12日；《陕西日报》1958年3月8日。

<sup>53</sup>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sup>54</sup> 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年。

几十年来，这些有名的妇女劳模和其他没那么有名的劳模所领导的务棉小组不但宣传和推广了植棉新技术，还宣扬了一种建立在小组承包制和包产到户基础上的精细的劳动分工。<sup>55</sup> 这些努力不仅得到了农业技术人员和妇联干部的支持，还获得了党和国家提供的物质帮助。一个劳模选出来之后，一些利益主体便会蜂拥而至，以确保她的工作计划能成功，各路资源也来确保有良好的结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和秋香乡里的信用合作社一起合作，确保她的合作社能够及时获得贷款。到 1958 年，银行已经为秋香的小组提供了 27 笔总额达 3,889 元的贷款。一份银行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具体的帮助消除了农民认为棉花亩产不可能超过一千斤的保守看法。秋香试验务棉小组的第二年，银行拖延了购买农药的贷款，秋香只好用技术站提供的一瓶杀虫剂将就。上级领导发出指示，说以后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银行紧接着便连续贷给秋香的合作社六笔肥料款和四笔杀虫剂款。银行报告里引用了秋香自己所说的话：“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你们对我的支持，一个人本事再大，要实现亩产千斤棉花是根本不可能的。”<sup>56</sup>

到了“大跃进”时期，妇女已经成了植棉劳动力的主要支柱，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男社员的反对，这些男社员要么已经退出了棉田管理，要么担心自己的工分会受到影响。<sup>57</sup> 关中一个植棉小组的故事广为人知：一个男人对妇女采棉挣的比他犁地挣的多感到不满意。他要求调去摘棉花，结果却发现他比不上采棉的妇女们，于是悄悄地溜了。据说他后来对其他男人说，“男女同工同酬就是对，别看她们做的活轻，咋可没有**哏**本事。”<sup>58</sup> 鼓励男人从事副业生产消除了他们对妇女植棉的反对。副业生产挣得更多且被认为需要更多的技术——这是男子退出基础农业的一部分。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可以找到这种退出的踪迹。<sup>59</sup>

棉花作为国防工业和农产品市场上的一项重要作物，为种植棉花的公社带来了相对良好的回报。陕西省超过半数的棉花都产在渭南地区，妇女被认为完全胜任了植棉所需的精细技术。<sup>60</sup> 如一位妇联官员所言，妇女心灵手巧特别

---

<sup>55</sup> 这些劳模的想法和技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965 年的一次采访中，张秋香在回顾她十年来作为植棉状元的经历时说，她当劳模的早期把太多时间用在了提高小块试验田的产量上。到 1965 年，她转而关注适合集体大块棉田的植棉技术（《陕西日报》1965 年 2 月 7 日）。

<sup>56</sup> 贷款（2,078）的一半以上用去买了杀虫剂，剩下的买了肥料。银行的报告还说，1955 年，银行借了 1,219 元给合作社，为秋香的务棉小组和合作社的丰产田买肥料和农药。到 1957 年，银行提前跟秋香的合作社预先规划了预期的资金需求。1958 年，银行表示愿意提供贷款支持合作社去实现亩产 2,000 斤籽棉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 1958 年：第 59-62 页）。50 年代，虫害是棉花种植中一个不断复现的问题；弗美尔（1988 年：第 358-59 页）详述了由棉铃虫、蚜虫、红蜘蛛和棉盲蝽带来的损失。

<sup>57</sup> 高小贤 2005 年，2006 年之一；与张秀玉（1996 年）、曹竹香（1996 年）的访谈。

<sup>58</sup>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编 1956 年：第 224 页。

<sup>59</sup> 高小贤 2006 年之一：第 602-3 页。她总结道，“棉花生产的女性化，虽然增加了妇女对农业的参与，却没有消除劳动分工中的社会性别等级”（第 604 页）。

<sup>60</sup> 关于妇女适合植棉的典型表述，见妇联 178-27-012 1958 年（3 月）。

适宜务棉花，棉花活从头到尾都是妇女干的。<sup>61</sup> 山秀珍也发现妇女尤为适合务棉工作：男的就干不了，务棉花的，你听人说：务棉如绣花，一针都不差。你一点都不能哄它，一株一株地，既要快还要细。<sup>62</sup> 然而，如果说针线活为妇女管理棉田做好了准备，那么另一句“大跃进”谚语则清楚地表明，她们为了从事务棉这项新任务就不得不放弃针线活：“停下针，放下线，务棉战线争状元。”<sup>63</sup> 秋香所在的大队于 60 年代初正式分配妇女去种植棉花；大队的副队长负责粮食和蔬菜作物，妇女队长则负责棉花。<sup>64</sup> 据称，公社超过 90% 的棉田分配给了妇女种植，约半数的麦田和玉米地分给妇女耕种。<sup>65</sup> 秀珍所在的生产队出现了四个不同的植棉小组，每组有 7 或 8 个妇女。秀珍很直白地说她的植棉小组更偏爱未婚妇女：人家都要来呢，家里负担重的，有 2 个娃的，我不要。务棉花比经管娃还谨心，姑娘娃没拖累，能随叫随到嘛。<sup>66</sup>

随着劳模们担任起额外的领导职位，参加会议便取代了她们在成为劳模之前所做的工作。而她们当初则正是因为这些工作才当上劳模的。早在 1951 年，一份民政局的报告就抱怨道，“劳模负担太重，许多地方……大事小事都找劳模带头……各级政府有许多会都要劳模参加，又有农林部，农林厅，专区，县，区干部和各报社的记者等，常去访问劳模，耽误了他们许多生产时间，差不多和脱离生产的 [全职] 干部一样忙。”<sup>67</sup> 几年后，当秋香在“大跃进”时期的一次全国妇女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时，她回忆说她公社的成员曾对她离家开会表示不满。他们对她说，咱们田里的毛草还没拔完哩；你可别只顾别人，并抱怨其他公社的人扬言要超过他们。

但对秋香而言，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正如她在演讲时对听众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竞赛的目的不是增加一块或两块棉田的产量，而是增加所有棉田的产量。只有全国的棉花生产得到了提高，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强调这一点，她在回家途中停留了一个星期，去帮助竞争对手、五朵银花之一的薛俊秀把棉花作物从虫害中抢救出来，尽管秋香的儿子还在家里生着病。后来，当俊秀植棉小组的棉产量超过秋香的小组时，秋香祝贺了她。<sup>68</sup> 紧接着，这两

---

<sup>61</sup> 与张秀玉的访谈，1996 年。曹竹香（1996 年访谈）说妇女务棉花将男人解放出来去从事大型的土地改良工程和修路。

<sup>62</sup> 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 年。

<sup>63</sup> “状元”指帝国晚期的科举考试中得到最高分的男子所获得的头衔。在妇女胜利地成为劳动大军的大跃进故事中，据说妇女不再与人说长道短嚼舌头，而是开始讨论生产问题，她们也不再攀比谁的丈夫更能干、谁的衣服更好看，而是开始比生产技能（妇联 178-216-002 1960 年 [1 月 17 日]：第 2、8 页）。

<sup>64</sup> 妇联 178-45-006 1961 年（7 月 31 日）。

<sup>65</sup> 妇联 178-216-002 1960 年：第 3 页。

<sup>66</sup> 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 年。

<sup>67</sup> “劳模运动的发展和问题”农业厅 194-8（未注明日期，在 1950 年至 1951 年之间）。

<sup>68</sup> 妇联 178-185-057 1958 年（12 月）。薛从 1957 年开始“向秋香学习”。据报道，1959 年 1 月，薛俊秀小组的产量是每亩 3,100 斤籽棉，超过了秋香的产量；报道还说，薛的小组准备“放一个亩产 10,000 斤籽棉的大卫星”。据报道，秋香小组的产量是每亩 1,002.7 斤皮棉（非籽棉），一块高额丰产田的产量达到了 1,440.3 斤皮棉。县有关当局指出，薛的平均产量是最高的，而张的高额丰产田的产量比其他丰产田高（《陕

个集体棉田彼此邻接的妇女于 1959 年 3 月签下一份保证书，承诺平均每亩要产出 7,500 斤籽棉，并向渭南县所有跟她们竞争的植棉妇女提出挑战。她们的挑战在一次由四百多名“秋香组”的妇女组长组成的大会上得到陕西省副主席的支持并被宣传。<sup>69</sup>一直到了 1959 年秋，新闻报纸还在报道她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和友谊，有时刊登的一些故事里还满是经过了再创造的、戏剧性的对话。<sup>70</sup>如一则 1960 年的新闻报道所说，“她们在竞赛中，既是对手，又是战友。”<sup>71</sup>

## 写作

劳动模范是制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从她们职业生涯留下的文字印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劳模的创造过程。从新中国初期开始，当地干部就被要求用干巴巴的、写官样文章的方式去记录劳模们的成就。一份 1951 年的陕西省政府的指令明确提出，这些记录应该首先表明这个人是什么类型的模范：“大体类型就可分为：治虫模范，治水模仿，积肥模范，精耕细作模范，救灾渡荒模范，生产模范……一般模范，及其他的模范互助组和模范村等等。”其次，作者需含括具体经验：该模范具体施了多少肥？地要犁多深？作物的轮换，灌溉，烟薰要过久进行一次？平均产量是多少？超过该地区的平均产量多少？第三，其村庄的构成是怎样的，它以怎样的方式组织劳力并记录备案，它的产量是多少，它在生产比赛中的干劲如何？四，劳模们促进了怎样的爱国活动，政治意识有什么提高？最后，指令告诫劳模材料的作者们，“劳模材料力求全面、具体、翔实。”<sup>72</sup>关于女劳模的材料则是这个大的官僚性文字体裁的一个子集。<sup>73</sup>这些女劳模们被动员去从事她们之前未从事过的任务。

到了 1956 年，当来自陕西各地的先进生产者聚集到一起开会时，记录劳模功勋的文件变得更加详细、完善和戏剧化。尽管劳模们的美德是相似的，会议档案记录里却包含了以前的报告里所未见的细节生动的故事。张秋香被誉为具有同情心的村长：在 1953 年帮助食物匮乏的家庭争取救济粮，家里粮食没了之后让她自己的孩子吃豆子，而不是把他们送到在县城工作的丈夫那里。她耐心地说服其他一些妇女跟她一起去锄冬麦，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当时锄冬麦还不是村里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不出所料，冬麦取得了极好的收成，结果

---

西日报》1959 年 1 月 5 日）。据薛俊秀叙述，秋香对输掉这次竞赛感到很高兴，并告诫俊秀也去帮助别人胜过她。有关薛的叙述，见《陕西日报》1959 年 3 月 31 日。

<sup>69</sup> 《陕西日报》1959 年 3 月 23 日，4 月 6 日；《渭南日报》1959 年 4 月 5 日。随后一个故事让山秀珍说明说她是如何被秋香所鼓舞，从而在自己小组的棉田上更努力地耕耘，获得了亩产八百斤的成绩。这个产量对她所在的相对干旱的地区而言，已经非常高了。这个故事还描述了曹竹香的辛勤工作（《陕西日报》1959 年 3 月 18 日）。

<sup>70</sup> 《陕西日报》1959 年 11 月 12 日。

<sup>71</sup> 妇联 178-216-002 1960 年（1 月 17 日）：第 8 页。

<sup>72</sup> 农业厅 194-8（1951 年 10 月 30 日），第 26-27 页。

<sup>73</sup> 一份典型的劳模文件的开始是一张表格，该表格给出了劳模的姓名，性别，年龄，他或她代表的是他 / 她自己的成就还是集体的成就，他 / 她的工作单位名称。这份表格下面的空白是填劳模故事摘要的地方，再往下则标明他或她获奖的类别（集体一等奖，二等奖，等等）（农业厅 194-534 [1956 年第 3-4 页]），第 81-85 页）。

整个村冬天都在锄麦，这也传递了一条隐晦的信息，那就是，将妇女拉到地里去可以增加耕作的集约度和提高收成。<sup>74</sup>

山秀珍 1956 年的文档描述了她当合作社主任时的三个英勇时刻。第一次是在 1955 年，一位想要退出集体的上中农在大庭广众下跪在她面前要求集体归还欠他的钱，并试图以此让她难堪。山秀珍利用她所受到的党的教育，用温柔的话语和耐心的解释化解了局势。第二个事件发生在 1954 年，集体决定让 15 名劳动力到山区去给棉花作物割绿色肥料。去做该项工作的男人们需要每天有人给他们送去馒头和面条，但妇女因为害怕被人说闲话而不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她们惧怕闲言碎语中暗含了在山里有不端性行为这样的内容。）山主任一边眼盯着生产目标，一边手拿着锅碗瓢盆，亲自准备并运送食物，从而使棉花产量破了纪录。在第三个故事中，她注意到一头牲口病了，便迅速找来兽医给它看病，还仔细地烧了开水亲手喂它吃药，救活了这头属于集体的、价值 300 元的牲口。<sup>75</sup> 这三个故事一起展现了一个女劳模的美德：温柔、有耐心、对集体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畏工作的艰辛又不受流言蜚语的影响，部分是因为她的行为无可指责；对集体的牲畜关怀备至，倾注了母爱般的关注。<sup>76</sup> 一个良妻贤母和节俭持家的主妇所应具备的美德在这里被用到了集体化的工程中。另一位高级合作社的主任鲁桂兰，在 1956 年的一次讲话中描述了她如何谢绝用合作社的经费去翻新办公室，而是选择将之投资到牲畜上，修理而不是买新的农具。通过这些勤勉和节俭行为，她教导合作社的社员们，“办社同过日子一样，没有个打算都不行。”<sup>77</sup>

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劳模材料强调了完成特定技术任务的重要性。1956 年，在一份关于劳模向一次全省棉花田间管理大会所作报告的出版物中，张秋香在担任其文书和编辑的妇联干部的协助下，用一系列方便的格言呈现了植棉过程中的各项作业。这其中包括：仔细准备土壤，撒肥料，选种和备种，早播种，间苗，除草，适时灌溉，对棉花进行打顶，对抗害虫，并利用改良技术收获棉桃。<sup>78</sup> 这类出版物都带着实用、详尽、实事求是的口吻，劳模们则为农业推广工作提供了具体示范。<sup>79</sup>

---

<sup>74</sup> 妇联 178-83-043 1956 年。

<sup>75</sup> 农业厅 194-534（1956 年：第 3-4 页），第 81-85 页。有关对张秋香、山秀珍、鲁桂兰和曹竹香作为农村妇女积极分子的简评，见妇联 178-161-074 1956 年（11 月）。鲁桂兰被评为一等，曹竹香被评为二等。

<sup>76</sup> 对丹凤县养猪劳模刘贤珍的介绍也有类似的文字：“她和猪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卖时几个人放街抬，而绑不到枷子。但她一个人从里路引到合作社，一路上她坐、休息了三次，猪卧了三次”（“养猪能手刘贤珍材料”未注明日期。）

<sup>77</sup> 妇联 178-78-062 1956 年（8 月 29 日—9 月 30 日）。她也同样兢兢业业地培养年轻的妇女积极分子和合作社工作人员，鼓励她们在合适的时候大胆说出和批评男领导们犯的错误。

<sup>78</sup> 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6 年，第 33-40 页。1958 年，一份面向植棉村民的小册子描述了张秋香和她的务棉小组所面临的组织任务：克服一块棉田可以产出多少棉花的保守思想，发明一种合适的记录工分的方式（陕西省农业厅 1958 年）。有关另一本带更多华丽辞藻的小册子，见陕西省农业展览会 1958 年。

<sup>79</sup> 有关张秋香的报道以及张秋香的讲话里提到的深翻，仔细选种，早播，间苗和定苗，如何用肥料（包括粪肥、老土砖、油渣、磷酸钙及其他物质），中耕，密植，打杈，用强效杀虫剂除棉蚜虫等害虫，改良采棉技术，见《陕西日报》1958 年 3 月 20 日；农业厅 194-519（1959 年 12 月）；《渭南日报》1960 年 5 月 15 日，第 4 页；《陕西日

到了 1958 年初，随着“张秋香”这个名字变成讨论高产棉花生产的代名词，劝勉和竞赛成了劳模故事的主导。<sup>80</sup> 在 3 月一次由来自陕西各地的 101 名植棉妇女组成的大会上，官方报告指出秋香亩产的棉花是平均亩产棉花的 8 倍，并号召成立干部、青年、妇女小组开展试验田工作以试图复制秋香的成就。<sup>81</sup> 3 月下旬，省党委颁布了一项指令，把秋香的方法称作是“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先进技术与农民经验相结合的植棉经验。”党委说，最直接的目标是在关中地区创造 5, 386 名秋香，51 个秋香组，和 7 个千斤公社。<sup>82</sup> 同年 4 月，就在“大跃进”开始前，妇联就发布了“学秋香，赶秋香”的宣传口号。<sup>83</sup> 紧接着出现了秋香田<sup>84</sup>（棉花试验田）、由十名左右妇女组成的植棉小组、向秋香学习劳动竞赛等创新之举。1959 年，更提出了“鼓足干劲，再赶秋香”的口号。<sup>85</sup> 由妇联干部介绍并由陕西省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鼓励在整个产棉地带推广秋香田。这些小册子打着像“‘黄毛女子’放出了棉花卫星”和“我们赶上了张秋香”这类标题。<sup>86</sup> 秋香自己在一份全国妇联刊物中被誉为“第一位农民出身的女研究员”。<sup>87</sup> 省级报纸和其他地方刊登了她的各种讲话。在讲话中，她提出要

---

报》1962 年 11 月 15 日；《陕西日报》1963 年 4 月 10 日。在《陕西日报》1958 年的那篇文章中，张秀香明确地肯定了男社员们在为棉田做准备上的功绩。甚至在“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当陕西省在 1963 重振棉花生产时，还继续出现这类文章。关于五朵银花的生产技术，见《情况反映》1964 年 6 月 26 日。

<sup>80</sup> 她的照片和工业及农业领域的先进生产者们的照片一道出现在 1958 年 3 月 20 日的《陕西日报》头版，报纸内页的几个故事详述了她的成就。张秋香（1996 年访谈）回忆，从那年起她的年最高棉产量为 250 斤每亩，这个产量是由十个年龄不一的妇女组成的植棉小组在一块试验田上生产所得。然而，那个时期的官方文件却称她为“千斤模范”，说每亩秋香田可产 1, 000 斤籽棉。比如，见妇联 178-27-012 1958 年（3 月）；妇联 178-45-006 1961 年（7 月 31 日）。

<sup>81</sup> 农业厅 194-407 1958 年（3 月）。

<sup>82</sup> 中国陕西省委 1958 年；妇联 178-27-012。陕西日报 1959 年 4 月 1 日重印了这项指令。

<sup>83</sup> 妇联 178-216-002 1960 年（1 月 17 日）：第 2 页。另一种宣传口号是“学秋香、赶秋香、超秋香”。比如，见《渭南日报》1959 年 4 月 5 日。关于“大跃进”，见马若德（MacFarquhar）1983 年。

<sup>84</sup> 有关秀珍在公社为创造秋香田所作的工作，见《山秀珍》1962 年，妇联 178-313-001。

<sup>85</sup> G 村的雷彩娃（2001 年访谈）在合阳县的一个秋香务棉小组。合阳县位于棉花带的北部边缘地区。那个地区的棉花产量比往南一些的务棉小组的产量要低得多：每亩 40 或 50 斤（2004 年与欧阳秀的访谈）。曹竹香在 B 村建立了一个植棉小组。该小组持续了三年左右，产量是每亩 120 斤（2006 年与周桂珍的访谈）。妇联也在其 1958 年的工作计划中要求“产棉地区的县，大力推广张秋香植棉小组棉花丰产经验，培养棉花高额丰产旗帜”，并提议培训女技术员和在每个生产队建立试验田（妇联 178-189-010，1958 年 3 月 11 日）。

<sup>86</sup> 中共渭南县委编著小组，1959 之一，1959 之二。启发妇女们在非植棉区开始试验丰产玉米田也被认为是她的功劳。她们对这些玉米田“好像母亲们在打整着自己的孩子”（《陕西日报》，1958 年 8 月 11 日）。有关报章上秋香及其小组成员自己的和关于她们的报道，亦见《渭南日报》，1959 年 3 月 6 日、7 日。

<sup>87</sup> 蒋兴汉、程万里 1958 年：第 6-7 页。亦见《陕西日报》1958 年 6 月 27 日；《工人日报》1959 年 9 月 22 日，第 6 页；陈庭梅 2003 年：第 276 页。“大跃进”期间涌现了大量对妇女喜爱科学技术的赞美。丹凤县有一群妇女发明了二十多种新农具（以及其他数百种物品，其中包括一种给孩子玩的汽车模型），见“女状元与女诸葛大显神

断稳步增加棉产量并详细解释了要如何增产。<sup>88</sup> 她视察棉田的照片、以及她向一个国有农场的老师和学生们授课的照片也都见了报。<sup>89</sup> 她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sup>90</sup>

据《陕西日报》报道，在张秋香被称为农民出身的科研人员后不久，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就冒着暴雨在秋香那块有名的试验田里对她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sup>91</sup> 4 个月后，同一家报纸又报道，继康之后，一位驻西安的苏联专家也冒着细雨前来访问。据报道，这位苏联访客曾对秋香说，中国的“大跃进”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前所未有的；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高兴。当他问张秋香是如何取得高产量的时候，张谦虚地笑着回答说：“这主要是党的领导，和大家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以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结果。”据说这位使者十分惊讶地回答道：“您的经验很丰富，苏联人民向您学习，向所有的中国农业专家学习。我回苏联后，就要把你们创造的奇迹，详细的告诉给苏联人民……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建设非常关心。”随后，张秋香送给他一个五六斤重的萝卜和一支超过 50 铃的棉花秆作为纪念。<sup>92</sup>

随着“大跃进”的推进和渐露颓势，这种政治幻想曲变得更加程式化。到了 1959 年初，据说秋香曾用诗句来形容政治和棉花的关系：

总路线是灯塔

照得人心开了花

今年有了总路线

要棉花开放比云大。<sup>93</sup>

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棉花的种植、劳模的英勇之举和全国的政治目标这三者依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饥荒迫在眉睫，秋香成了 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上的一名主题演讲嘉宾。她在演讲中将解放前的苦难同解放后的幸福作了鲜明对比，吹捧增加的棉产量，并颂扬了她的公社为终止频繁的洪水所做的治水工作。她说，尽管 1959 年旱灾严重，公社依然能够有水灌溉并取得丰产。渭南农林畜牧局随后对她的讲话进行了“修改、补充、核实”，并打磨了讲话语言、突出了每个故事的重点，以使她的讲话变成一曲颂扬人民

---

采” 1958 年（或 1959 年？）。在 1958 年的一次演讲中，山秀珍描述了她领导建立的一个由妇女管理的细菌肥料工厂工程，见妇联 178-198-040 1958 年。

<sup>88</sup> 例如，她提出了一个新目标：她公社的 282 亩棉田要每亩产出 1, 000 斤籽棉，由她和其他十位妇女种植的 4.3 亩棉田则要每亩产出 3, 000 斤籽棉。见《陕西日报》1958 年 8 月 2 日。

<sup>89</sup> 《陕西日报》1959 年 6 月 23 日。

<sup>90</sup> 农业厅 194-673 1960 年（2 月 9 日）：第 6-13 页。很多著名劳模都身居政治职位。鲁桂兰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陕西省妇联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省和市人大代表、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农业厅 194-673 1960 年 [2 月 18 日]，第 17-24 页）。山秀珍是省人大代表（农业厅 194-534 1956 年）。

<sup>91</sup> 《陕西日报》1958 年 7 月 5 日。

<sup>92</sup> 《陕西日报》1958 年 11 月 7 日。

<sup>93</sup> 《陕西日报》1959 年 1 月 1 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指共产党在“大跃进”之前和期间提倡的一系列目标和首要任务。



公社好处的赞歌。<sup>94</sup> 作为一个全国劳模，秋香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农业推广工具、或是国家效果的化身，她是集体化可行性的发言人。<sup>95</sup>

“大跃进”之后，陕西妇联不断地提到张秋香的威望和成就，提出棉产量是一个持续提高的领域。（考虑到陕西的情况相对稳定，这些有关棉产量增加的说法未必就是大跃进“浮夸风”的产物，但具体增产量是否属实则需要进一步调查。）<sup>96</sup> 关于秋香不断成功的报告成了一种弥补“大跃进”所留下的残局的手段。一份这样的报告通过说明秋香的大队和每个队员会挣到多少现金和食物补给，精明地迎合了农民的物质利益。这对一个面临食物短缺的省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论调。<sup>97</sup> 报告结尾用一首新作的“民歌”将秋香竞赛同人民公社联系起来：

人民公社一枝花  
花开十里香万家  
妇女到处闹竞赛  
秋香红旗遍地插。<sup>98</sup>

节俭和勤勉的劳动模范将在不牺牲政治忠诚的情况下引领经济的复苏之路。<sup>99</sup>

---

<sup>94</sup> 农业厅 194-673 1960年2月6日，第6-13页。同一个文件夹中还有一份类似的文件，以小传、而不是演讲的形式，记述了鲁桂兰和她决心向张秋香和其他劳模学习的决心：“渭南张秋香创造玉米、棉花高产记录的干劲和动力长久地激励着她的心。白天她更专心一意的开会，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她狠狠地责备自己：‘鲁桂兰呀！鲁桂兰！人家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缺胳膊吗？缺腿唉？’她越想越难过，但她随即用被角擦去刚涌出来的泪花。‘光难过顶啥用，要下定决心。干！非在农业生产上干出个名堂来不可。’……她务着这块棉花，像一个勤劳细心的母亲，兢兢业业地抚养自己溺爱的孩子一样”（农业厅 194-674 1960年[2月18日]，第17-24页）。高小贤在看到档案材料中一沓沓的劳模演讲时，说她自己对这些材料并不感兴趣（我2001年4月与高小贤的交流）：这些可能都是妇联不同的人写的。这个加上这一句，那个把东西改一改，然后变成自己的。所以讲话稿之间的差别不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张秋香的信息，只告诉了我们给写她讲稿的不同人之间有何区别。我自己在刚进妇联时也写过劳模文章，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当然，地方干部在做生产劳模的工作时还需要将地方上的理解和愿望考虑进来；一个成就被国家吹捧但却跟当地的社会结构没有关联的劳模是没有什么效用的。

<sup>95</sup> 例如，见《渭南日报》1959年9月2日。

<sup>96</sup> 在1960的一篇文章中，曹竹香称1959年她的小组在丰产田的平均亩产是1,688.5斤籽棉，最高的是1,815.2斤，平均亩产比秋香多40[注：根据下文，此处应为400斤更合理]斤。在潼关的一个半山区植棉的山秀珍汇报说她的产量是1,265斤——这意味着她赶上了秋香。她希望到1960年时亩产可达两千到三千斤（《陕西日报》1960年4月24日）。

<sup>97</sup> 报告说秋香的大队有1,150亩地种棉花。如果每亩产量是100斤皮棉的话，这将为队里带来92,000元收入，平均每户家庭有206元，每人有40.7元。由于每售出3000斤皮棉，国家便奖励35斤粮食，生产大队即可以获得40,250斤粮食，每户家庭大约可得90斤。（妇联178-45-006 1961年7月31日）。

<sup>98</sup> 妇联178-45-006 1961年（7月31日）；有关这首顺口溜，亦见妇联178-216-002 1960年（1月17日），第9页和《陕西日报》，1960年4月2日。这个版本是1月17日报告的修正版。

到了1961年3月，关中的植棉经济全面感受到了恶劣天气和“大跃进”多次失利带来的影响，尽管大部分问题还没有公开说出来。国际三八妇女节前一天，也即种棉花前一个月，《渭南日报》大幅刊登了多篇关于当时已都是著名植棉能手的五朵银花的文章。其中张秋香致力于抗旱，薛俊秀聚焦于棉花选种，山秀珍集中关注当地的植棉条件，高贞贤集中负责犁棉田，曹竹香则集中在平衡棉花和粮食种植的必要性上。<sup>100</sup> 这五位妇女植棉能手一同在全县作了参观并召开了植棉讨论会。她们讨论了干旱和牲口短缺问题，认为有必要让各生产队之间共用耕畜——这间接道出了当时日渐困难的境况。<sup>101</sup>

只字不提及危机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夏，当时农业局和妇联共同召开了一次植棉者大会。1958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生产目标消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播种的棉田如何在干旱期间缩水、又在夏季遭受洪水重创的清醒的讨论。会议报告指出，有15%的棉田套种了粮食。由于一些县不把套种粮食放到国家的征购指标内，可吃的粮食数量便因此增加。据说农民将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了套种的粮食上，以致忽略了棉花作物。植棉的农民们宣称他们并不支持这种做法，但他们也说要提高棉区的粮食生产，还说要在国家开始征购粮食前保证食物的供应。虽未被具体言明、但很明显为大家所关心的，是无处不在的食物短缺问题。与会者们认为秋香模式现在很难普及，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只有在肥料上、劳力上实行高投入，这一模式才会生效。大会重申，秋香模式的精髓不在于昂贵的投入，而在于抓住了科学种植的“客观规律”：看天看地务棉花。但大会没有像“大跃进”时期那样，花大力气去动员妇女干农活（在下一章中讨论）。报告对妇女是否能那么轻易放弃针线活而奔向棉田提出了质疑。报告（在提及经期、妊娠和生殖健康时）说，妇女有她们自己的身体特点和家务劳动的负担。在对劳动进行管理时有必要考虑到这些情况。<sup>102</sup>

然而，妇女植棉劳动模范同党和国家广阔的政治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直持续到三年困难时期结束。1960年，《渭南日报》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说薛俊秀和曹竹香曾从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中收益良多，这个主题以前从未如此明晰地在之前有关劳模的著述里被提及。文章既说明了农村妇女识字能力的提升，同时也证明毛的文章的力量。<sup>103</sup> 1961年末，《陕西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张秋香的访谈报道。她在访谈中强调，农民应该把棉花卖给国家——这清楚地

---

<sup>99</sup> 1960年初，曹竹香的植棉小组就因效仿秋香、在1959年保护棉花作物不受冻和受旱而获得“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报告还说，曹竹香的小组抵制保守分子们的嘲笑（妇联178-244-015 1960年3月2日）。

<sup>100</sup> 《渭南日报》1961年3月7日，第3页。

<sup>101</sup> 《渭南日报》1961年4月5日，第1页。

<sup>102</sup> 农业厅194-747 1961年（7月14日）。《陕西日报》（1963年3月6日，第3页）在与山秀珍的一次访谈中也提到农民喜欢种粮食甚于种棉花。弗美尔（1988年：第348页；亦见第510页注98）发现，“全国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从1959年的550万公顷降到了1962年的350万公顷，”这是农民对粮食短缺的清晰回应。

<sup>103</sup> 《渭南日报》1960年5月5日。这个新重点可能跟“大跃进”时期对农村妇女识字关注度不断上升有关，但文章并没有明确表明这两者间的关系。《陕西日报》1961年12月11日。

表明，农民和采购部门之间的角力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sup>104</sup> 1962年，妇联出版了一本关于山秀珍的小册子来作为基层妇女干部的学习指南。该册子以政治美德、而非农业作为其组织构架。这个标题为《山秀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长达13页的册子下设副标题，每个副标题都用带有伦理道德意味的词语提炼出她成就的精华部分，如“志气高，干劲大”和“迎难而上”。<sup>105</sup> 秀珍在其他的出版物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观点。几个月后，她在一篇新闻报道中说，“我是一个农村妇女。自小受苦讨饭，什么都不懂。有了党的领导，我才翻身见太阳，懂得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幸福、最理想的社会。”<sup>106</sup>

1964年，随着一部分有关“大跃进”失败的评价进入公众讨论，劳模们受到褒奖的品质正是那些五年前会给她们招致批评的品质。例如，一份头版刊登的关于秀珍的专题文章，对她在1959年和1960年拒绝制定不现实的生产目标和虚报产量的做法进行了表扬。随着国家进入“大跃进”后的复苏期，她和其他劳模被再次用去体现当时最具价值的品质。这些品质包括：诚实、实用知识（她在1963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羊粪可作为绝佳的肥料）、言行一致、谦逊（即使在她的棉产量超过了秋香的之后，她依然称秋香为“老师”）和对党忠诚。<sup>107</sup>

关于劳模的文字记录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一些文章将植棉劳模及她们的学徒作为组织文字的手段，以相对丰富、活泼的形式介绍了一些技术知识。另一些文章则以一种类似于汉代刘向《列女传》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楷模式的人物和她们的道德行为。同《列女传》以及后来关于典范妇女的文本一样，<sup>108</sup> 关于劳模的文章通常在标题里便表明了该劳模最主要的美德是什么。随着这些劳模故事的内容越来越明显地同对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交织在一起，妇女劳模

---

<sup>104</sup> 弗美尔（1988年：第348页）指出，从1953年到70年代，棉花价格一直维持低水平，按比例计算，一公斤的棉花相当于6.25公斤小麦。他认为“国家对价格的控制和合作化销售对品种、种植和加工等在质量上的改进并没有什么帮助”。

<sup>105</sup> 《山秀珍》1962年。这篇作品还刊登在《陕西日报》（1962年1月25日，第1-2页）上。在一份使用这份学习材料的后续报告里，许多地区汇报说他们应该先对当地的工作予以肯定，然后再学习关于秀珍的材料，这样才可以鼓励人们作出比较。这份报告提醒道，否则，有些妇女干部可能会觉得她们无法达到秀珍的标准，而其他一些年长的干部则可能态度倨傲，认为秋香并没有什么可让她们学习的地方。报告指出，有些公社甚至要求男干部也以秀珍作为学习榜样（妇联 178-313-009 1962年6月4日）。《陕西日报》（1962年3月7日，第2页）报道说，五朵银花以支持国家棉花政策和为植棉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的方式来迎接国际三八妇女节。

<sup>106</sup> 《陕西日报》1962年3月7日，第3页。有关其他山秀珍写的、或关于山秀珍的文章，见《陕西日报》1963年3月6日，和1964年4月25日。根一篇3月6日的文章称，陕西省在1963年也举行了一次植棉大会。有关张秋香在“大跃进”之后所作的类似表明政治决心、有时还夹杂着技术种植建议的表述，见《陕西日报》1963年2月27日，3月19日，4月10日，5月31日，7月29日。1964年，张和一个年轻的同事去了浙江给那边的农业工作者们发表讲话。（《陕西日报》1964年4月4日）。

<sup>107</sup> 《陕西日报》1964年4月25日，第1页。有关山秀珍用羊粪作为肥料，见《陕西日报》1963年3月6日，第3页。有关元代的典范妇女，见柏文莉2002年：第510页。

<sup>108</sup> 有关元代的典范妇女，见柏文莉2002年：第510页。

的具体特征已不那么重要，她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承载革命美德的容器而存在。<sup>109</sup>

关于妇女劳模的记载通常只是偶尔才涉及劳模的性别。<sup>110</sup> 比如，曹竹香之所以成为劳模并不是因为她成功地兼顾了照看孩子和田里的工作，也不是因为她明确地提出要将妇女拉到家庭空间之外的生产当中去。她既没有清楚地道出、也没有克服那些即使党已经发出了男女要平等的号令，却依然顽固地存在于日常工作和社会期望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又或者，即使她清晰地表述出且克服了这些差异，关于劳模的故事也不会对之作出报道。劳模故事的目标是宣传棉花生产、团体组织和政治忠诚在地方上的成功。虽然妇女进入生产彻底改变了她们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分工领域内的地位，但有关妇女劳模的文字——甚至可能连劳模的主体地位本身——都淡化了那场巨大变革的重要性。

## 记忆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 50 年代在“大跃进”中渐入高潮，关于劳模生活的文字记载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平面单调，充满了英雄事迹和事后想像出来的政治对话，然而却越来越缺乏惊喜和深度。从传记中寻求真知灼见的历史学家想将目光转向他处，如生动活泼的当面访谈，但访谈的结果却很复杂：时而生气勃勃、发人深省，时而毫无情感、模糊不清。比如，曹竹香就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她当上劳模后的新的活动圈子，并让我们对她的活动如何影响儿子、以及对农村劳模如何贫困有了初步的认识：那就是那一年冬季，那开的也叫土改积极分子，还有干部吆，也有劳模会，没回来，那一回出去要开一个来月会哩，反正这一回出去要几十天，一个月叶，把些那小的娃吓的，那一个个都吓娃哩，这么你妈走了，这么你妈不回来了。连我一伙送到县上，开个

---

<sup>109</sup> 棉花种植没有继续扩张。弗美尔（1988 年：第 371-75 页）指出，在 60 和 70 年代，“由于棉花价格低廉，农民们除了将国家分配的植棉土地用去植棉之外，并没有兴趣把集体的土地用去种植棉花”。农民们也不会在家里的自留地上种棉花。与此同时，随着化肥、农业以及其他投入的引进，生产的成本也增加了。农民们开始更喜欢小麦、玉米和其他作物。弗美尔还指出，虽然国家可以要求把一定数量的土地用去种植棉花，但棉花的低回报意味着“农民很可能不愿意把优质的土地和珍稀的资源用在种棉花上”（第 374 页）。农田被用去修路、建房和建工厂是棉花生产裹足不前的另一个因素。终于，在 80 年代初，“一旦家庭责任制给了农民更大的自由去自主选择耕种作物，关中大部分地区的棉花种植都减少了”（第 379 页）。

<sup>110</sup> 据一位前陕西省妇联干部所言，当时有 25 名妇女被授予省劳模称号，占了总数的 22%（1996 年与李秀娃的访谈）。高小贤（2006 之一：第 600 页）指出，“最初（为植棉竞赛）在动员妇女时强调的‘男女同工同酬’，随着整个棉田管理的活路都交给妇女之后消失了”，在关于张秋香的文字中，“很难找到任何跟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妇女的发展，妇女的地位，以及妇女的解放有关的内容……‘向张秋香学习’变成了一项纯粹宣扬植棉技术的运动。‘妇女解放’及其影响消逝了，或者完全体现为妇女从事劳动。”高还注意到，对张和其他妇女来说，一项重要的经历是，通过这些运动获得技术技能，并且，相比起建立一个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她们更致力于“获得以前只有男子才有的社会地位”（第 605 页）。

座谈会，第二天早，搭车又到西安开，西安没地方，都在旅舍里住着哩，农村干部多，工作组在西安开，开了十来会，陕北的洛南，可怜太太，那头一目人都想穿都没啥穿，都那单衣服，就那出差哩咄，穿那单衣服也都是互相借哩，后此跟住到西安市可动员，都给支援，各地方一开会，在西安一阵阵那衣服送的那东西，旅舍那院里下满了，也有被子，也有棉的，也有单的，也有夹的，也有呢子的，起码先叫开会来的这些穿暖和，那一阵我去都还背被子呢。

竹香回到家时，儿子十分惊讶，同时也放下心来。她再次去开会时——这次是场劳模大会，她带上了儿子。那旅馆也大，那下把我娃搁的不离我了，咋样谁非跟不行，后此人都说把那引上，我那娃只有这么高，把外引上，我不让他出来，他一天停了房子，我一天开会。<sup>111</sup>

竹香的儿子王积极记得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曾带他去西安。那段记忆在他的讲述里颇为神奇。50年在西安开的劳动模范大会领的我，我这名字，我现在名字就是那个时候。我叫王机娃，机构的机，人家给了十块钱，我姊妹两个，那时那十块钱能买钢笔就了不得了，我妈给我和我姐一人买了一支钢笔，华庆钢笔，害怕我丢了，就叫人给我刻个名字，人家问叫啥名字，那叫个王积极，刻名字的时候就刻了个王积极，名字就是那个时候叫王积极。<sup>112</sup>

然而，总的来说，当劳模们追忆起她们集体化时期的生活时，她们的叙述很快就变成了历数她们曾参加过的一系列会议，讲述的故事也基本上没有她们解放前的故事那么具体和鲜活。有关农村的人们和事件的记述几乎全部消失不见，更不用说对问题和冲突的记述了。例如，我们在采访张秋香时就对她感到困惑不解。她的故事非常特别，她一开始便提到自己曾被周总理接见过十三次，被毛接见过九次。对她而言，那些会面中最重要的是周总理对她个人特别表现出来的关心。她回忆道，叫我到中央开会，去坐的火车，见了毛主席，见了周总理，把我叫到会客会谈话，问这个群众生活好不好，把我接到国务院，周总理就问炼钢铁的时候群众的锅到砸了，周总理说让人把你们叫来了解，弄的白米饭，还弄了一大桌子菜，给每个人都夹些，领导实在好，咱农村妇女吃的流泪。开毕会，都叫给他本本上写个字，我也叫他写个字，后此回来，本本叫谁看给不见了，回来到处给人讲群众都高兴的很……我年年棉花会都去，那年在怀仁堂，人都坐齐了，领导还没来，周总理来没上台子，在桌子上把本子

---

<sup>111</sup> 与曹竹香的访，1996年。

<sup>112</sup> 与王积极的访谈，2006年。

站起来对我说，秋香你来了，后头外些人说：光问外，不问咱，周总理见了群众心近的很。<sup>113</sup>

但当说到其他话题时，秋香的叙述里却夹杂着长久的沉默，她在陈述时也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并且缺乏热情，但在谈到周总理的时候就一样了。她对谈论劳模的具体日常工作不感兴趣，或许是因为她上了年纪，感到疲乏，抑或是，她对我们一直不停地询问她在组织其他村民时遇到了什么困难感到厌烦。我们想知道，是否或许她的生命已如此接近尾声，以致她对我们所问的问题一知半解？又或者是她已如此彻底地习惯了她的劳模身份，以致她无法跳出劳模的思维界限？每次高小贤问到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她都变得越来越不满，直到最后她完全拒绝讲话。<sup>114</sup>我们对访谈突然终止感到尤为惊讶，因为克服困难的故事在关于劳模的叙述中十分常见；问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引起任何争议或令人感到唐突。

她的沉默寡言或许反映了由我们的问题所刺激起来的痛苦记忆。如同所有的杰出劳模和领导一样，她在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攻击：打成反革命了，嫌我一天开会哩，村上三、四个人。

高小贤：这三、四个人当干部了没有？

张秋香：没有，比干部厉害。

高小贤：他凭啥说你是反革命？

张秋香：我不搞生产，一天胡跑哩。

她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被戴上了“假劳模”的帽子，并被拒绝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她说，她不在的时候，周恩来亲自替她说情。周总理说西安来人了么？西安人都立起来，周总理就问学生都来了，老师咋没来，前头那人说外没解放哩，周总理说没解放，弄棉花哩，搞生产哩，啥反革命，后晌会毕了，黑了就给县上打电话，叫把我送去，我说去连钱都没有，县委叫司机开的车把我送到车站，给我拿的钱，都黑了，后来，坐火车是卧铺，到北京，到车上我病了发烧，到招待所，住到他候车室，也见到了周总理，从那开会回来，咱省上叫收音机上来三个军队住到村里，把那人抓走，就给我回话，黑了开群众会，……从那才解放的。<sup>115</sup>

秋香随后得到了平反，但她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曾颂扬过她的中央和地方领导要么因为过早离世因而无法为她的晚年提供帮助，

---

<sup>113</sup>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 年。有关官方记载的周恩来对张秋香的关心，见郭 1993 年。张对周恩来的记忆和这篇 1993 年的文章可能已经受到了周逝世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去世后关于周英雄品质的话语的影响。非常感谢艾华（Harriet Evans）注意到这个关联。

<sup>114</sup>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 年。

<sup>115</sup> 同上。

要么对她生活得如何并不关心，因为她已经不能够再在北京的高台上为大家撑门面了。我们在一座破败的房子里采访了她。这座房子比邻村的房子都要破得多，还是妇联在极力为她争取到全国前劳模的退休金之后盖的。任何一些因为太痛苦而无法对陌生人言说的记忆中的伤痛都可能解释——也可能无法解释——她为何突然终止了与我们的交谈。我们无法读懂她的沉默。

更多的、或者不一样的交谈或许会对我们读懂她的沉默有帮助。2008年，距离我们的共同研究12年之后，高小贤在回忆起我们1996年与张秋香的访谈时说道：我觉得有好多准备不足。我觉得对她的当时的一些状态了解的还不是很清楚。而且，时间又那么特别短……本来就没有跟她牵记建立关系。又加上再有一个老外，还有当地的妇联干部的陪同下，再这么突然去访谈就要问很多很内部的话我觉得不一定能问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坐下来，住下来，跟她有一段互动我们前期做的好的准备工作，或者我们跟她有一点熟悉的过程，象曹竹香那样我们住在她的村子家里头有一点关系的建立，我觉得可能那个互动又是不一样的……对张秋香不是完全了解，对这个人当时生活的状态不是很了解。对她个性也不是很了解。可能那个进去的那个入门也说不定选择不是很好的时机和很好的环境。因为当时她还有她自己家庭的，她的生活……状态很不好。这是老婆子心里感念状况不好的话呢，就跟她当年的劳模对她的人身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当然问她当年的时候她会连上到她现在。当年她为什么那么辉煌，现在那么凄惨？可能给她心里对她是一个打击。我都没有敏感到这些东西，都没小心的处理这些东西。

我这些年做农村发展我都有个体会就说是，做访谈，应该说没有问不出来的问题。只有说，如果有问不出来的问题，这就是说你访谈的人太笨，你对对象不了解。这是我的对第一年访谈的感觉。我回头看前几年2003年、2004年写的这篇文章我看了那访谈，我自己就觉得脸老发红，就有一些问题问得那么幼稚……所以我只能说学的研究，跟艺术一样。所以艺术家常都说有一个遗憾的艺术。我觉得说一个研究一样……但那个过程不能再来。那我做研究我也感觉到。但下一工作的形情仍然会犯同样的问题。因为你对这个问题全部知道的话，你不用做研究了。就要研究你不知道的就是有这个过程中的问题（大笑）。<sup>116</sup> 问更多不一样的问题，或用不同的方式去问问题或者可能会让我们对张秋香

---

<sup>116</sup> 我本人2008年11月10日与高小贤的交流。这些观察所得以及我们无法根据一个单一的访谈去把握语境的因素这一事实，也表明了口述史与长期的种族志研究相比所展现出的不足。

有一个不同的理解。但是访谈并不是一个一直处在最优情况下的灵活场合，也并不总是能够被重新审视。<sup>117</sup>

一个对历史学家具有警诫作用的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关于围绕在我们的圣杯——“历史记载”——周围的沉默无言的故事。在我们的所有访谈中，什么样的沉默决定了对问题的回答？有哪些担忧没有说出口？哪些不确定因素磨平了叙述时的感情？我们访谈时的基本情况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访谈中，我们自由地活动，也没有带随行的人员。高小贤是大家都熟悉和信赖的人；通常让他们的子女和邻居们明显感到不自在的是，人们会在某些问题上对我们倾吐心声。这些并不是精心为外来者准备的“波特金”式的虚假村庄或故事。但是记忆的工作不是在可轻易勾勒出来的领域内进行。秋香故事里逐渐陷入静寂的部分没有她作为劳模的丰功伟绩所具备的电影般的吸引力；它甚至都没有一个故事线。这个部分或许是尚未解决的政治上的不满，或许是一份跟亲戚或邻居发生矛盾的记忆，亦或者是一些我们因所知不够而无法去猜测、以及因经验不足而无法在这个研究项目一开始就去询问的东西。只要我们去思索这其中的不确定性，就有一些值得探究的东西。<sup>118</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劳模们变得最活跃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最无法理解她们与劳模角色、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虽然在四十年后，这些妇女已对她们曾在其中起过领导带头作用的一些运动的细节搞不清楚，她们却流利地用 50 年代的听众耳熟能详的习语来说明革命带给她们的生活。正如鲁桂兰所说，我这身子是父母生的，但教育培训成人长大，是共产党、毛主席、各级妇联对我的培养。49 年 7 月我们区上去了一个管政工的干部，在我们村上去了。我正在机子上织布呢！把我跟机子上拉下来，在村子里给妇女开大会说要选一个苦大仇深，……要能干……我没有官名，人家当时叫我小名，我小名叫荣荣。我这个鲁桂兰就是那一天起下的。我为啥最后那么样积极，不顾死活。我母亲给我讲“娃呀！你傻的，你都不怕国民党过去把你杀了，你都没看把刘胡兰拿铡马子腰了。”“我不怕！入党宣誓讲的很清，刀山火海我就下呢！我死重于泰山。”<sup>119</sup>就由这，省妇联、市妇联，我们区妇联、西北妇联，甚至于全国妇联都抓我

---

<sup>117</sup> 张秋香死于 2000 年。据一份当地报纸报道，她问儿子老衣是否备好。儿子说都备好了，放在一个箱子里。她说，“你可睡去吧，我也睡下了，累得不行。”她于夜里寿终正寝。

<sup>118</sup> 安·斯托勒（Ann Stoler）和凯伦·斯特拉斯勒（Karen Strassler）2002 年访谈曾为荷兰人做过家庭帮工的印度尼西亚人时发现，她们的故事都出奇地缺乏感情。这些故事听起来既不像生活在殖民地的前荷兰居民所著述的那些充满了情感的文字，也不像反殖民的下属群体进行英勇反抗的故事。Stoler 和 Strassler 猜测，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印尼苏哈托的高压政府所提供的关于过去的官方叙述对荷兰人持暧昧不明的态度。她们写道（第 176 页），“讲述荷兰殖民时期的个人经历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合法性或‘认可’”。“巧妙的转变、逃避躲闪和程式化的回答指出了记忆的裂缝之处。这些裂缝既是不安和无关的地方，也是安全和有关的地方。”（第 175 页。）

<sup>119</sup> 有关众多积极分子所提及的少年共产主义烈士刘胡兰的背景情况，见第四章注 43。“死重于泰山”的说法出自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他提出，一个人的死（延及一个人



着。和人民和各层妇联和党政培养我花的那经济，花的那代价比一个大学生花的钱多的多。……我这个人也能劳动也能吃苦。<sup>120</sup>

记忆远不是那些犯规越界的、愤懑不满的、甚至是反思性的故事的源头，而似乎变成了将集体时代的劳模话语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这些集体时代的话语随后被极少关注这些妇女的改革时代的世界所抛弃。考虑以下两个这样回忆与毛主席会见的例子。

对鲁桂兰来说，作为代表去北京开会不但给了她一个团体，还在家乡之外给了她一次令人激动的、与其他有类似背景的妇女社交的机会。她嘲笑自己在宏伟的北京就是个天真幼稚的乡巴佬：我的天呀！吃的那饭，住的那地方；北京饭店么！你看往进走，那门还转呢！叫人往那空空往进走，自动转悠转悠，我都不懂。还有一个笑话呢！山秀珍到北京饭店住宿。那房子里这镜子那镜子，她一进去就说：“噫！这咋还是个我？这咋还是个我？”我几个在省上开会猴的很，张秋香，山秀珍，曹竹香、我们一黑里唱戏呢！弄的碟碟，碗碗，线板子做针线那一天纳鞋底呢！线板上砸上、筷子敲上，唱戏呢！我一天给她片上，胡片呢！我最热闹人家把我叫闲传处处长。热闹的很，热闹的很，我这么还想那几个大姐。<sup>121</sup>

参加任何全国性会议的顶峰就是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近距离接触。这样的接触经历总是能够在事后的讲述中引发强烈的情感。在这里，北京一家饭店的房内全女班随意轻松唱戏的欢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靠近党最高领导人的庄严的喜悦。作为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山秀珍在1953年3月见到了毛主席：头一餐上都没人睡觉，第二天，在哪住，都记不起来，一晚上高兴的，洗澡洗衣服，都弄的干干净净……在怀仁堂，啥都摆的好好的，……陕西代表在中间我还在前边，代表坐好，毛主席、总理、副主席、总司令、中央领导要来五十多个人，……毛主席来了你欢迎就对，不要动工，一动就乱了，就会说这妇女没有觉悟，不遵守纪律，不敢拉毛主席握手，要爱护毛主席，你这些人，毛主席都握手，你不心疼毛主席，提前讲，我就好好坐下，毛主席就来了，人多坐个园圈，毛主席笑笑地，把他的帽子一谢，我的只在旁拍手，走了两个过，不走两个过，这边妇女能看见，那边的妇女就看不到毛主席了，把人高兴的，都流了眼泪了，这是第一次在北京和毛主席照像，遗憾的，咱陕西代表，农村来就我和闫主任，照的像要七尺长、有五尺长，洗像要十七块钱，洗不起，没有钱，没有洗。会开毕，回来了。

---

的性命的重要性）可能比鸿毛还轻，也可能比泰山还重。毛主席在1944年的讲话《为人民服务》中也用了这句话。（1967年：第177页）。

<sup>120</sup> 与鲁桂兰的访谈，1996年。

<sup>121</sup> 同上。

遗憾的是 57 年召开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我们照的像，有秋香、竹香，会上给我们一人洗了一张，遗憾的是 66 年文化大革命给我拿走弄丢了。这是最遗憾的了。<sup>122</sup>

会议是枯燥无味的汇报和聆听的场合，是偶尔在外地建立同志感情和进行欢闹的场合，也是劳模作为政治主体而受到最彻底质询的场所。即使时隔近半个世纪之久，尽管这期间的许多不愉快的事件给她们带来了个人的和政治的后果，但突然看到毛主席的那个时刻似乎从未失去光泽，这次与伟人的见面重塑了她们日常劳动的意义。与那些旨在宣扬她们成就和歌颂她们政治觉悟的文字相比，这些妇女的个人故事更能最全面地显示出她们是如何充分彻底地参与到产生了她们的政治时刻中去。

## 传记和内在性

劳模的故事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传记。它们与社会紧密相连，目的是为了在它们自己的时间内进行沟通、激励和动员。这一时间便是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样的故事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它们在历史时间中又如何起作用。

尽管中国农村在国家的倡议和宣传中具有显著的地位，但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在日常生活和农民意识中所带来的变化依旧不甚明了。作为在文字的印迹中鲜有的一些有名有姓的妇女，农村劳模为我们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然而，尽管我们能够搜集到大量的材料，可以采访对那些年月还有记忆的妇女，但我们能否获得洞察历史的传记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能就像我们能否从刘向《列女传》中的贤女故事和明清方志中的节妇故事中洞察历史这个问题一样复杂。

访谈显示，劳模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活动，深刻塑造了这些妇女的自我意识和她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尽管口述历史揭露了文字资料中所未显现的挣扎和妥协，但妇女们在回顾她们作为劳模的过去时所用的语言也正是

---

<sup>122</sup> 根据一篇关于山秀珍的官方传记，她去过北京 8 次，并 4 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潼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 年：第 3 页）。第四章一开始就提到的主张婚姻自主的积极分子冯改霞（1997 年访谈）当时也在这个会上。她记得当时邓颖超教导她们不要同毛主席握手，这样会伤害毛的健康。邓是周恩来的妻子，她自己也是一位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我坐的是十三排呵，除过四、五排呵，毛主席来了都坐好，毛主席来了招了个手，一下都没人坐了来，上的上到桌子上。张秋香呵，她跟我坐到一堆的，从桌子底下钻过去跟到毛主席握了个手到嘛，我都站到我这个椅子上，胆子小啊，邓大姐给我们讲了嘛，前面都站到桌子上来了，爬的从底下爬，我还是个不得行，我个子又小，那时才十八岁，不得行，也没年到 lei ba（弄前）里去，唉呀我 这一生的遗憾！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这一天。那时就是没有把照片说到出来，因为那时我才二十块钱的工资呵，洗张照片，十五元，是我工资的四分之三。

她们所回忆的那个历史时代所产生的语言。她们的故事有时谴责过去，有时用过去来表达对当下及当下不足之处的不满，有时则向这个正在忽略她们的世界叙述她们的美德和价值。但她们从未同过去脱离，也从未拒绝集体化赋予她们的主体地位，尽管这些地位早已不复存在。她们对自身劳模角色的强烈认同，既清晰地体现在她们关于在北京的招待所房间内唱戏或毛主席接见的记忆中，也同样体现在关于她们在棉田里的丰功伟绩的著述中。总之，她们的记忆与国家建设的工程或官方历史的语言既不相悖，亦无法分割。

许多妇女处于劳模这一位置，以致我们无法独立于这一位置去理解她们的主体性。随着她们走向生命的尽头，她们仍然用国家曾提供（后来又废弃）的语言去表达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劳模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性行为、政治冲突、鲜为人知的忆苦的原因，我们依然无法获得。它们不是在书面材料中未被提及或没有得到完全说明，就是在访谈中未被问及或没有得到回答（尽管不是完全未曾涉及）。尽管高小贤想要回去再一次次进行尝试的愿望（我也持同样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她们的故事对一个在许多其他领域已遭受攻击，但在历史学界仍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提出了质疑。这个理念就是，只要我们挖掘得够深，那个具有与公众视野内的模范形象截然不同的内在个人的真正自我就会自己显现出来。

我们对 50 年代的研究无法含括以下论题，如想象的、纯粹的内在性，非常规的个人变化的故事，脱离于国家话语或与国家话语相抵触的人生，以及个人自我和集体自我的真相等等。事实上，50 年代的材料以及近来对 50 年代的回忆表明，整个试图寻求真正过去的真正自我的工程是一个空想。50 年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构筑出一种新妇女如何诞生的叙述：她们不是在国家的政令中诞生，而是在干部们的、妇女们自己的、她们本地社群的、以及地方乃至全国的读者和听者大众的劳动中诞生。这些劳模们的生平故事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隐藏的内在真相，也不是引向当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那类生命书写，而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共同的创造世界的工程中去。这些故事表明了“内在自我”本身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概念，而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对它的依恋是值得我们用怀疑的目光来审视再三的，就如同我们对任何原始材料所进行的审视那样。劳模不一定告诉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但她们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我们需要去聆听的经验教训。